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论

——黄曼君自选集

黄曼君 著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论

——
黄曼君自选集

黄曼君 著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论——黄曼君自选集/黄曼君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ISBN 978-7-5622-4095-2

I. 中… II. 黄…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史—中国—文集 ②当代文学—文学史—中国—文集 IV. I20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5563 号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论

——黄曼君自选集

© 黄曼君 著

责任编辑:周利伟

责任校对:张晶晶

封面设计:朱俐颖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15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7

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3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编写说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已走过百年,其前身为文华书院大学部 1909 年设立的中国文学系(文华大学 1924 年更名为华中大学)。百年来,华中学人严谨治学,代有建树,为今天文学院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此次借“211 工程”建设项目东风,并获得学校和出版社支持,我院筹谋编辑“教授文库”,逐年推出教授自选代表作,结集出版,旨在弘扬学术,传承薪火,以延文学院之文脉,亦尽我辈之责任。

文学院教授文库编委会

2009 年 10 月

前言

在我“从心所欲”之年，得到机会来编选这本“自选集”，是一件令人十分欣慰的事，这对我一生的学术生涯是一个总结，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也是一种新的鞭策。

编选这本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论》的自选集，我大致遵循的是如下几个原则：

一是关于学术活动纵横时空的考虑。纵向看，重点选取新时期不同年代的成果，有新世纪的，也有上个世纪90年代、80年代的，同时也选了一篇上世纪60年代初的论文《〈创业史〉的长篇结构与人物描写》。横向看，所选成果应该代表我从事的学术活动各个方面的内容，有一定的覆盖面。其中不仅主要是现代文学的，还有当代文学和文论方面的成果。同时，除了科研方面，还有教学方面的成果总结。这样纵横交织的展示，不仅能使人看到成果的全貌，还能使人在某种程度上看到学术道路的发展。

二是关于学术类型史、论、评的考虑。书中所选成果，史、论、评都有。第一部分主要是史，前四篇是史的概括论述，史中有论，如关于新文学经典的发生发展，新文学传统的发生发展，新文论的发生发展等。为了突出史的观念，这一部分还根据新文学史的发展安排了关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40年代国统区文学以及“延座”讲话的论文各一篇。第二部分是以为论为主，所选作家作品因为许多是现代文学历史上的，所以论中又有史，还选了一些当前的，所以又论中有评。第三部分是关于学术思想、教学经验的成果总结，则史、论、评都是交融在一起的。

三是关于学术效应质与量的考虑。编选自选集当然首要的是选优，注重所选成果的典范性，甚至于是原创性，但在注重“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定的“量”，这“量”，就是要考虑到我在上面所说两点的方方面面，但总的来说是要求质与量的结合。例如本书所选《〈创业史〉的长篇结构与人物描写》一篇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我二十五六岁时所写的论文，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的质量的，今年湖北作协编选的《湖北文学60年》选我的作品就只选了这一篇。还有，关于《母亲文化：深沉、激越的“寻根”浩歌——评岳恒寿的中篇小说〈跪乳〉》一篇是我为纪念我的好友岳恒寿不幸早逝而选的。这篇评论本是预约好了要登

载于《中国作家》杂志的，但后来该杂志领导认为与《跪乳》登在同一个杂志上有自我吹嘘之嫌，所以只好另找地方发表，结果是《江汉大学学报》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作为该学报第一篇文章发表了。

以上是我对“自选集”的一些考虑，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就是关于注释的规范问题，因为有的文章发表的时间较早，当时不注意注释的规范化，而现在再查证又不可能，所以有的文章的注释就只好遵照历史的面貌了。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

黄曼君

2009年7月24日

目 录

前言	(1)
----------	-----

一、文学史论

回到经典，重释经典

——关于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	(3)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	(14)
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形成新型传统	(29)
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总体特征	(38)
回归中的超越	

——对“五四”文化精神的反思与辨析	(57)
左翼文学创作方法问题略议	(69)
民族新文学性格的重塑和再造	

——浅议 40 年代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历史进程	(77)
文艺经典现代性言说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60 周年	(83)

二、作家作品论

鲁迅论创作思维的特征	(91)
发展鲁迅研究三题	(106)
《女神》创作灵感试论	(112)
自然科学的时代精神与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	(124)
闻一多文化诗学论	(137)
论沙汀小说艺术再现的特征	(149)
《创业史》的长篇结构与人物描写	(162)
余光中的现代诗学品格论	(170)
现代民族文化品格的弘扬与铸造	
——赵淑侠海外华人题材小说论	(180)

文化溯源与历史重构

- 评杨书案三部长篇小说新作 (189)

母亲文化：深沉、激越的“寻根”浩歌

- 评岳恒寿的中篇小说《跪乳》 (200)

- 关于现代鄂籍作家研究 (207)

三、学术思想论

文学史家的智慧和魅力

- 王瑶学术思想初探 (215)

反思重构中探寻

- 我的学术之路 (225)

- 新文学“以美引真臻于善”教学体系刍议 (241)

文学教学改革跨世纪的建构

- “20世纪中国文学”教学体系的阐发与运作 (252)

- 附录 (259)

文学史论

回到经典 重释经典

——关于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

一、经典的言说

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来看，无论是对现代文学有无经典的讨论，还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焦虑与危机感，都与对经典的涵义的理解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应该怎样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呢？我以为，概括起来说，可以从思、诗、史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既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的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它常常提出诸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灵与肉等人类精神生活中某种根本性的问题。同时，经典与经典阐释有着如影随形的密切关系，经典必须持续不断地被汇集整理、接受传播、称引崇奉，才能成其为经典。原创性的经典还需要原创性的阐释，而原创性的阐释又可能成为新的经典或具有新的经典性特征。如朱熹的《四书集注》之于孔孟儒家经典，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20 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经典如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四世同堂》等之于《红楼梦》，都有程度不同的原创性，具有新的经典性特征。

第二，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它是在作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渗透下不可重复的艺术世界的创造，能够提供某种前人未曾提供过的审美经验。它是基于感性生命、精神需要乃至个人和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对于世界的独特的审美把握。这种审美把握通过原创性努力，涵纳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与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而且还以生成着、行动着的“在场时域”将过去和未来的生命吸纳于当下。这样创造出来的文学经典能使人性、人心相通，文心、诗心相通，从而使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得到深层沟通。

第三，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这也就是说，文学经典，特别是那些可称为“元典”的文学经典，能促使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思想登上一个新的平台。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英语和英国文学的现代性、普希金之于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现代性一样，鲁迅

中国现代文学史与论

和“五四”新文学经典模式也是通过现代汉语独创的艺术世界，把我们民族的语言和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平台。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现代文学的作家和理论家们在这个平台上共同操作、交流和创造，进而出现一系列的经典性的成果。

由上可见，文学经典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西方自柏拉图直至近代，思想史上主要是“思”与科学、宗教（非原宗教的上帝，而是科学理性所制造的僵死的上帝）的对话，少有思与诗、思与史的对话。思与诗、思与史的分离被推向极端，“思”只承认科学认知与宗教认知经验。于是，“思”愈来愈“纯粹理性”化、“哲学化”。滥觞于康德，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随着尼采“上帝死了”的呼声，宗教没落，“纯粹理性”受到扬弃，西方现代思想开始了“诗性转向”。“思”的对话对象由科学、宗教转而为“诗”，诗学成为了一种重建价值、重新解释人生的新的文明、新的存在方式。而作为诗学这种自由意志产物的复写品的历史学，也不是过去仅凭史料和因果规律起作用的领域，而进入了有着自由意志的精神科学的领域。随着中国社会在现代转型中由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文化的发展，西方突出“诗性转向”的思、诗、史相交融的现代思想传入和影响中国，中国社会文化汇入世界潮流，也发生了向重主体、重精神的转变。思、诗、史相融合的新文学经典便在这种“诗性转向”中诞生。但是，文学的革命叙事与救亡主题却往往使这种“诗性”出现问题，革命、救亡主题中虽然也包含着主体实践、主观意志的“诗性”成分，但当意识形态与科学主义胶结在一起而强势地一元化，政治成为新的“上帝”时，知识无法“中立”，价值不能实现精神超越，审美也不能形成独立品格。这样，“思”的实用理性化，思、诗、史隔离对立、发生矛盾冲突，便使经典之间、经典阐释之间，乃至对经典与经典阐释进行系统整理、系列考察的新文学史之间也出现矛盾复杂局面。具体地说，这种矛盾复杂局面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看到与现代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学经典，它作为特定时空的一种历史话语，有着被确认的权威的价值和地位。这里，先从现代性的确定性特征谈起。在西方，现代性寄寓着人的启蒙理性和主体性原则，人成为意义的唯一来源；而且它还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模式提供建构与运作的合理性依据。在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表现为个人主义和国民性等启蒙话语与民族国家观念相融合；由器物而制度而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导致人的发现、新的艺术精神的觉醒与科学的发现；接着政治、经济先行思想文化后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精神的缺失的局面，又导致在政治意识形态制约下人的精神价值与审美自由追求的受限，科学理性和知识系统“价值中立”立场的丧失。正是这种由革命、审美、学理、崇众、尚用等多种维度构成的意义空间，赋予了新文学

经典以特定的内涵，使其具有历史品格与现实品格；同时，这些经典创造者又以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原创的艺术世界，揭示了丰厚久远的文化内涵与人性意蕴，使其具有超越品格与恒久品格。正是这样，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特别是经过文学史的历史叙述，这种文学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在萌生与勃兴、发展与曲折、成熟与繁荣的历史进程中，铸就了一批权威性的文学经典，新文学整体也成为一种经典性的存在。

另一方面要看到，由于体现了反思性和问题意识的现代性特征的作用，新文学经典又并非凝固不变的绝对化和终极化事物，它们在被阐释、被接受、被解构中显示出特有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征。与西方每一个时代有一种从内部生长的主要的社会哲学思潮和文艺美学思潮不同，在中国，由于西方近代的、现代的乃至古代的种种思潮的同时传入，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潮发生冲撞和交汇，因此种种思潮纷繁多样而又发展不充分。如大陆的现实主义由于与政治意识形态结合而发展不充分，以致到了新时期有那么多的现实主义品种出现。但大陆另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台、港、澳也有多种文学思潮。这样，在20世纪的中国，由于各种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完备形态，因而体现了现代性而又能与世界文学媲美的文学大师和经典为数较少；同时，受多种思潮左右的对经典的阐释更是多种多样。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对经典的确认与阐释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特征。到了有批评家和广大读者参与创造，以批评家和读者的主动性来实现文本的完整性的接受美学评价时，文本开放的自由度和阐释的空间又要大得多。八九十年代“重读大师”热衷种种对大师与经典的重新排名和民意测试等，便有着明显的个人阅读与接受的特征。后现代解构思潮的影响，其价值多元、意义的不确定、阐释的冲突等主张，作为解构策略，展开文本差异，促使文本裂变，更对经典进行拆解、戏拟、拼贴。但是，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新文学经典，只能将历史与现实对立起来，将个人阅读与公众空间对立起来。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人沉溺于“影响的焦虑”之中，而孤立绝缘的当下个人趣味和阅读也无法阻断经典的超越性、多元性的延传。同时，种种个人接受和言说，种种拆解和戏拟，也不符合接受美学与解构理论的原意。因此，用机械的眼光来看新文学经典，看不到它们的延传变异的特点，不符合经典本身的含义，也违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历史事实；而相反的极端，只要“当下”没有“往昔”，只有“我”没有“我们”的绝对化个人阅读，则无法操作、交流和创造，无法进行经典阐释，也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经典化的历史的。

二、回到经典化的历史变动本身

回到经典，重释经典，要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与“立说”的历史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与论

物“处于同一境界”。^[1]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既然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思、诗、史对立统一关系的体现，而这种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不同的特征。因此，以当下现代性的言说，重新整合的历史视阈与返本开新的态度，对新文学经典的古今转换以及它的诞生、延传与重构的过程进行梳理与考察，是很有必要的。我以为这一经典化的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承受“欧风美雨”，冲击千年陈规，在求新、主逆、尚变中转换中国古今文学经典（1898—1918年）。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主要是文史哲杂糅、文笔混沌的杂文学经典。现代意义上文学性强的诗、词、曲，特别是小说、杂剧等是不能被称为经典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较早摆脱了中世纪一统形态的西方文化，实现了类似于思、诗、史关系的科学、道德和艺术的分离与重组，它们各自自律而又互动互渗。作为人文主义一个组成部分的西方美学思想开始促使中国传统的文艺审美观念向现代转换，促成了文学的自律和现代艺术精神的觉醒，促成了由古代杂文学作品向现代意义新文学作品的转换；作为科学主义一个组成部分的理性解析精神和逻辑实证方法，促成了现代知识结构和学理精神的发扬，从而为新文学经典化创造了必要条件。例如，王国维便是一位审美独立品格论者。他的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以西方悲剧理论解读《红楼梦》，凸显出个性与审美的自由，揭示出人的存在的悲剧性。它从知识范畴上突破了传统的文质、道技等关系，形式上表现出重逻辑、重分析和理性化的叙述模式。这些都是对传统知识系统载体的扬弃。他的另一著作《人间词话》虽然脱胎于古典美学精神，却充溢着新的美学意蕴，他在解说前人诗论的基础上刷新了关于诗歌的“境界”说。围绕真感情、真景物的核心观念，王国维将受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影响的“造境”与“写境”的概念，与中国传统文论演化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结合起来^[2]。因此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就成了中国古今文论过渡转换时期的经典。如果说王国维主要以对古代文学经典的解读为古今文学经典的转换进行美学理论的准备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初几年的胡适便试图通过文学改良与白话文的提倡，沟通古今文学经典，使它们发生对接与转换。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论文及一些书信时，鲁迅的《狂人日记》尚未发表。而他这时候已经一方面将过去许多文言经典归为“死文学”而加以否定；另一方面则将元代以来的白话文学作品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及关汉卿的戏曲等视为“活文学”而加以肯定。他不仅将后者视为“足比世界第一流文学”^[3]的经典，而且认为现实中吴趼人、李伯元、刘鹗等人的作品是受古代白话经典的影响而成为新的“第一流”^[4]作品的。

第二阶段，广纳世界思潮，借助政治推动，在“五四”精神模式建构中新

文学经典的诞生（1918—1928年）。

中国现代文化在思、诗、史等方面的分野发展和重新组合，经过维新改良运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洗礼，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态，促成了新文学经典的形成和诞生。“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模式作为一个整体，它的追求个性解放和生命价值的主体意识，自我反省与文化反思相交融的理性精神，反迷信、反盲从、反依附的科学态度和学理意识，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关心民众的平民主义、投身改革与革命的参与激情，以及文学回归自身、进行语言文体变革的形式追求和新的艺术精神的觉醒等，都是富有新的时代特色和超越精神的经典形态与模式。正是在“五四”精神模式的“意义空间”中，出现了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开山”的新文学大师和经典。他们的作品确实呈现出文学经典在精神意蕴、审美品格和史的定位上所必需的新锐性和前卫性，原创性与独特性，丰富性和多义性，超越性与恒定性。虽然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人进行创作的艺术方法、体裁样式不同，艺术风格、气质个性各异，体现文学经典的方面和程度都不一样，但他们作为语言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作为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能够产生不朽艺术魅力的“卡里斯玛”特质，却是大多数新文学研究工作者和新文学史家所认可的。正因为《呐喊》、《彷徨》、《女神》等文学经典具有丰富复杂的内涵，以它们为代表，集中凸显和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独特的精神审美模式，因此将清末至“五四”的文学变革成果推到民族语言思想的一个新的“平台”。有了这个“平台”，不仅呈开放多元特征多层面、多角度对经典进行的阐释、接受是在这个“平台”上；对经典的质疑、问难与挑战，消解、戏拟与重构是在这个“平台”上；而且，文学经典与文学经典之间交流、联络与影响，革新、创造和独立，也是在这个“平台”上。

第三阶段，凸显救亡意识，深入民族现实，在多维阐释空间中新文学经典的延传（1928—1978年）。

这个延传过程存在三对关系：革命与审美的关系、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关系。这三对关系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在强调主体、精神和审美的“诗性转向”前提下思、诗、史的变化组合。这就形成了几个系统的经典：一是政治社会系统。这个系统的经典有茅盾的《子夜》，艾青的诗歌，郭沫若的历史剧，毛泽东的“延安”讲话等。二是精神启蒙系统，包括胡风、冯雪峰的文艺思想，鲁迅的杂文，巴金、老舍、曹禺的创作。三是审美感悟系统，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与穆旦的创作，朱光潜、刘西渭的文论属于此类。四是学理认知系统，以梁实秋、钱钟书为代表。此外还有以张恨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经典。这些经典有时交错，有时对立。而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的、民族的、大众的倾向逐步压倒了审美的、现代的和精英的倾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论

形成了政治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是，尽管审美、学理在不断膨胀的“革命话语”的压迫下越来越成为一种“潜话语”，但在这样的“潜话语”之下，30年代前后有沈从文，40年代有张爱玲、钱钟书这样的经典作家，坚持文学的独立审美品格与学理品格，超越现实人生，深入到生命的审美形态或学理形态中。沈从文的《边城》并不是仅仅给我们展现一幅民俗风情画，带我们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旅行，而意在从喧扰纷繁的现实中抽取出一一种坚守自然人性的生命形式，赋予其永恒的神性。张爱玲的《金锁记》也不同于巴金的《家》，其意不在于表达对某一制度的憎恨，而是通过曹七巧和她的儿女两代人的命运，感悟人的生命世界在轮回中毫无所得，只有失去，以至空虚，以至毁灭的苍凉。而在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则象征了人被抛入一种境遇后身不由己、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具有存在主义的品格。钱钟书的文艺学术巨著《谈艺录》、《管锥编》等则以其体大思精、知识渊博、领悟玄奇、思理邃密与反体系的创构而成为现代文论与学术的经典。至于巴金、老舍、曹禺、艾青的作品，则是属于在革命与审美的张力下比较执中的一类经典，一方面有倾向革命一边的进步倾向，因而被冠以“民主主义”的称号；另一方面又不是为了某一特定的政治团体和思想主义而创作，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艺术的独立性，表现出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其命运要平坦得多。不论是过去重视政治的时候还是当今淡化政治的时候，他们的经典地位一直是比较稳固的。

第四阶段，大幅度对外开放，深度回归传统，在多元共生、歧异消解中新文学经典的重构（1978年— ）。

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经典的延传与重构体现了思、诗、史关系的重新组合。在各人文学科的专业领域和文化文艺领域里，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主义相胶结的强势一元化态势逐渐淡化和边缘化，主体、精神、审美的诗性特征日益彰显。这次新文学经典的重构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文学的存在空间由一元单质到多元异质。由于政治的开放，过去处于相互隔绝状态的大陆文学和台港澳文学实现了交流与互动。台港澳文学及海外华人文学进入和冲击大陆文学，不仅带来了同样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不同的、新鲜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海外华人文学在创作上有着杰出成就，如余光中的诗歌，白先勇、金庸的小说创作。与这三位海外经典作家的创作同时，大陆的文学则处于相对狭隘的意识形态的一元视角下，整个的文化格局也处于封闭状态中。

二是在西方思潮大规模涌入与全方位开放（包括方法热、多学科交叉透视、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多种人文学科的引进等）的同时，兴起了“国学热”，展示了向传统深度回归的新景观。它与上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当然有相似

与联系，但是它所面对的是已经臻于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的新文学，是已经不平衡地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不平衡地现代化，并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呈现出一定的后现代特征的特殊社会形态，因此它站在与“整理国故”不同的高度之上，以更为阔大的世界文化视野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国学热”的出现，使得世纪末的中国文学经典化呈现出一种整合的态势，即立足于时代的要求，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向西方引进、拿来的同时，大规模地向传统回归。这种回归就是整合，这种整合又被推向世界，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共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在对鲁迅、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经典重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整合，而且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真正具有经典价值、可以积淀下来的作品也是这种整合的体现，或符合这种整合要求。陈忠实的《白鹿原》正是这样，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对人本身和对人的生命欲望、对历史的荒诞与非理性的探索，从而以新的视角来观照反思浸透了厚重传统文化的一段地域和家族的历史，如一股生活之流，在展现生活原生态的同时，全方位地穿透了生活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自然属性。这部作品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心态上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有留恋与沉醉，也有严峻的拷问和批判。这一切都体现出了它产生于尚未完成的经典重构过程中的特征。经典重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在多元和开放中进行反思的整合过程。

三、阐释中的新文学经典世界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进程密切地伴随着对经典的阐释进程。只要我们将经典阐释的眼光深入到历史上经典与阐释的关系上去，便可以看到一个丰富多彩而又绵延变异的阐释中的新文学经典世界。这个阐释的经典世界摒弃了抽象机械的教条与极端个人化主观随意性的伪阐释，它既要求回到经典文本本身以及产生它的历史原初语境，是一种向经典本身趋于还原的阐释的科学形态；又因为 20 世纪文化主体性增强、转型中中国社会变化发展迅速，经典阐释的视角转换多、幅度大，诸多阐释之间往往发生矛盾冲突，因而这种阐释又呈现出开放、多元和超越性特征。本文上两节曾谈到新文学经典是体现着主体性精神的思、诗、史的融合，这里，对新文学经典的开放、多元、持续的阐释也贯穿着主体性精神，却存在着偏于思的思之诗、思之史，与偏于诗的诗之思、诗之史的宏观体系性阐释，以及思、诗、史三者多重组合的体验性阐释等类型。

在新文学经典中，阐释世界覆盖面最广，震撼力最为强烈，视角变换最大最频繁，阐释空间中差异和矛盾最为显著，延传时间最为恒定持久的当然首推鲁迅。在鲁迅的阐释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述两类偏于思的与偏于诗的体系性阐释。30 年代的瞿秋白、40 年代的毛泽东是对鲁迅及新文化、新文学进